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第二卷）

主编 郑杰文

李梅 郑杰文等著

秦汉经学学术编年

上

 凤凰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第二卷）

主编 郑杰文

李梅 郑杰文等著

秦汉经学学术编年①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汉经学学术编年 / 李梅等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5. 7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 / 郑杰文主编)

ISBN 978-7-5506-2116-9

I. ①秦… II. ①李… III. ①经学—学术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Z126.2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5016号

- | | |
|---------|---|
| 书 名 | 秦汉经学学术编年 |
| 著 者 | 李梅 郑杰文 等 |
| 责 任 编 辑 | 汪允普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 226300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32.625 |
| 字 数 | 878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116-9 |
| 定 价 | 206.00元(全二册)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3-80237871)

本成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批号09AZD051）
最终成果之一

本成果为山东大学“985”二期工程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总 序

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肇始于周公制礼作乐,经后人发挥、补充而反映在儒家早期原典中。这类儒家早期“经典著述”,到孔子传学时已有“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秦汉间“乐经”亡佚而剩“五经”。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使广大学子对传承、阐释、发挥儒家经典趋之若鹜,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经学著述。经学著述所承载的经学成为历代王朝的主导学术,经汉学、宋学(理学)、清学(朴学)等发展阶段,留下了数以千计的注经、说经乃至改经的著述(如《中国丛书综录》即收此类著述7646种);20世纪的一些中国学人继续从事此类研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经学论著和数以万计的经学论文(参见林庆彰等《经学研究论著目录》各编);研究汉学的国外学者如日本学者也多涉此而留下数量众多的著述(参见林庆彰等《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经学研究从而成为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门类之一。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经学的发展变化史,就难以真实把握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略,就难以深刻认识历代文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品格,就难以切实了解中华民族的性格品质和文化风俗。

中国经学史的专门研究最迟从明代就开始了(如明人朱睦㮮有《授经图》20卷)。其成果若按通史和断代史区分,前者流传较广的有清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有中华书局出版周予同注释本等)、近人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有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等)、今人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姜广辉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另有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及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学生书局)、甘鹏云《经学源流

考》(广文书局)、李威熊《中国经学发展史论》(文史哲出版社)、日本人安井小太郎等《经学史》(林庆彰、连清吉译,万卷楼图书公司)、日本人本田成之《中国经学史》(孙俚工译,广文书局)等。流传较广的经学断代史类著作有章权才的《两汉经学史》(万卷楼图书公司)、王葆玟的《西汉经学源流》(东大图书公司)、洪乾祐的《汉代经学史》(国彰出版社)、程元敏的《三国蜀经学》(学生书局)、汪惠敏的《三国时代之经学研究》(汉京文化事业公司)、汪惠敏的《南北朝经学初探》(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章权才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汪惠敏的《宋代经学之研究》(台湾师大书苑)、章权才的《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吴雁南主编的《清代经学史通论》(云南大学出版社)、李新霖的《清代经今文学述》(台湾师大国研所硕士论文)、田汉云的《中国近代经学史》(三秦出版社)等。

这些著述各有优长,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像姜广辉研究员批评皮锡瑞《经学历史》和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时所说的那样,“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彝尊的《经义考》等”(国际儒学联合会网,2006年1月20日登载姜广辉《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础研究资料的选取面失之过窄。这不能过分责怪他们,在不能使用电子检索的时代,单凭作者一个人或者十几个人,要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基础研究资料,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但是,任何学术问题的研究都应建立在最充分地占有最广泛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不偏颇、深入而不肤浅。要想写出一套真实反映中国经学历史面貌和规律走向的《中国经学通史》,必须首先从梳理数以千万计的基础研究资料入手。这种梳理工作历代都有人在做,其成果如简博贤有《今存三国两晋经学遗籍考》(三民书局)、《今存南北朝经学遗籍考》(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今存唐代经学遗籍考》(台湾师大国研所硕士论文)等。但是,现今还没有一种全面系统地概括这类基础研究资料的著作问世。

上个世纪末,我曾约庄大钧、王承略、刘心明、宋开玉、刘保贞等

同仁合作撰著六卷本《中国经学通史》。着手撰写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难以在创新性方面超越前代著说。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基础资料掌握不全。于是决定先从经学学术资料编年入手。2005年,为了促进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科研工作的开展,时任院长的王学典教授主持策划了4个重点项目、18个一般项目作为研究院科研课题,《中国经学学术编年》被列为重点项目。

经学编年这种形式,可以细致真实地表现某朝、某代、某时、某地的经学流派、经生经师、经学传承、经学著述、经学思想、经学主潮的面貌,并通过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系联方式,来反映某时、某地、某朝、某代的主导学术著述、主导学术思想、主导学术思潮的发展、变化,以为今后撰写多卷本《中国经学通史》提供研究基础。而当今电子检索手段,又为我们处理经学史基础研究资料众多与时间短、人手少的矛盾,提供了解决路径。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以时间为经,以相关传世文献资料和出土资料的编排为纬,以编年形式来全面反映西周至清末三千年间的经学史面貌和规律走向。其主要内容有五大方面:一、经学著述资料(依据其影响程度分“重点”和“一般”两类,收录时前详后略),如儒家原典的萌生、经典化过程资料,及其后历代注经解经乃至改经的著作提要等,含经书校刻、流布等资料;二、经生经师资料(亦依其影响程度分“重点”和“一般”两级收录),如经生经师的生平大事、性格思想、师法家法,以及经学传授系统等资料;三、经学事件资料,如历代王朝的经学政策诏令、“焚书坑儒”之类历史事件资料,特别是历次古今文经学斗争等资料,并含礼乐制度、馆阁校书、科举、书院等资料;四、经学思潮资料:在上述资料之外的可反映历代经学思潮的资料和反映经生经师学术思想的资料;五、经学背景资料:与经学相关的各朝各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资料。

《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编写形式为:按朝代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代”、“清代”8卷,卷下分年(标出帝王年号、干支纪年、公元纪年),年下按月份为序

排列各条资料,各条先列月份和题目(题目要概括其下的文献原文大意),后有文献原文摘录(类似文献用“互见法”),再后是考论(有必要考订年代、考察事件或人物思想时),最后是后人“相关研究论著举目”。其中,“文献原文摘录”是重点,每条必不可少。

全书分工撰著,各卷进度不一。陆续交稿后,我在审读前,先请某些同学校核文献原文,并将所用文献版本(见各卷后《主要参考书目》)的页码标注出来,便于读者使用。今年春天,最晚一卷稿子交来。全部8卷稿成,郭森、殷仁允同学在体例统一及抽核文献方面付出了很多心力。至今审读编辑完成,交凤凰出版社出版。请同仁们在使用时多加批评,以利于改进。

郑杰文 2011年7月17日撰
2014年12月27日补

编纂凡例

一 收录内容

(一)《中国经学学术编年》以时间为经,以相关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编排、考证为纬,以学术编年形式来全面反映西周初年至清末(1911)三千年间的经学历史面貌。

(二)《中国经学学术编年》收录的主要内容含五大方面:

1. 经学著述资料(收录详略,依据其影响性大小分详、略二级),如儒家原典的萌生、经典化过程,及其后历代注经、解经乃至改经的资料(含经书校刻流布资料)等。

2. 经学人物资料(收录详略,依据其重要性大小分详、中、略三级),如经生经师的生平大事、思想性格、师法家法,以及经学传授系统等。

3. 经学事件资料,如历代王朝的经学政策资料、“焚书坑儒”之类历史事件资料,特别是历次古今文经学斗争资料,以及礼乐制度、馆阁校书、科举、书院资料等。

4. 经学思潮资料:上述资料之外的可反映历代经学思潮的资料和反映经生经师在此经学思潮下产生的学术思想的资料。

5. 经学背景资料:与经学相关的各朝各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等资料。

(三)《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的收录重点是经学著作、经学人物、经学事件的原始文献资料。

二 编录形式

(一)《中国经学学术编年》按朝代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代”、“清代”八卷。

(二)《中国经学学术编年》各卷以“二级历史分期”为卷下一级目录,如《秦汉卷》下分《秦代经学学术编年》、《西汉经学学术编年》、《东汉经学学术编年》;以“帝王年号、甲子纪年、公元纪年”为二级目录;以事件条目为三级目录。

(三)每卷先列本卷目录,次为正文,后有附录(除依据书名首字笔划为序附录本卷所用书目、版本外,还依据各卷情况附录无法编年的、却富有参考价值的经学资料,如先秦之“出土文献”,秦汉之“纬书所见秦汉经学学术”。

(四)每卷正文分年(标出帝王年号、甲子纪年、公元纪年)编排;年下按月份排列各条编年资料(无月份者排在此年之月份资料后)。

(五)每条编年的结构为:先列月份和题目(题目要概括其条文献大意),后有文献原文摘录(在索引文献之书名和篇目后标出所选版本的页码),再后是“考论”(有必要时),最后是近现代“相关论著举目”。

(六)“文献原文摘录”是每条编年资料的重点,先录最早出现者,后录后世有新见者,其它相似内容之文献的处理用“互见法”。

(七)“考论”主要考辨著作或事件之疑年,或发表针对本条编年人物的思想或著述的新见解等。

(八)近现代“相关论著举目”收录与此条资料相关的近现代论著目录。

三 【文献】及【考论】所定通用版本

为保证全书各卷体例统一,特规定【文献】及【考论】中引用频率

高的古文献之通用版本如下：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影世界书局缩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

“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点校本。

《太平御览》，李昉等，中华书局 1960 年影涵芬楼影宋本。

《艺文类聚》，欧阳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新 1 版整理本。

《经典释文》，陆德明，中华书局 1983 年影印本。

《北堂书钞》，中国书店 1989 年影印光绪十四年（1888）南海孔氏刊本。

《初学记》，徐坚，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整理本。

《文选》，萧统，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整理本。

《四库全书》，影印文渊阁本。

《四库全书总目》，纪昀等，中华书局 1987 年整理本。

前言

本编年逐年排列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建立统一帝国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共 441 年间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汉代是经学发达的时代,故皮锡瑞《经学历史》对西汉与东汉分别冠以“经学昌明时代”与“经学极盛时代”。秦汉经学学术可分为秦、西汉、东汉三个阶段,其特点分述如下:

秦时燔灭《诗》《书》,文化政策非常酷烈,但却并未完全造成经书传承的彻底中断。首先的原因是秦祚短暂,如汉初著名的经学家,《诗》之申公、辕固生、韩婴,《尚书》伏生,《礼》之高堂生,《易经》之田何,都出生在秦火之前,而一直到汉初仍然在世,正是他们,延续了五经的传承,并于汉初开山立派,为汉代经学奠定了基础;其次是秦并非焚尽一切书,而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则博士官所职所藏,即有《诗》、《书》、百家语,并且,秦之禁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而“《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书·儒林传》);第三是民间可能仍有传习,刘邦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儒林列传》),说明至楚汉之争时期,鲁地礼乐传习仍未中断。以上这些,都是汉初经学得以发展的条件。

西汉初期,学术渐渐复苏。《汉书·惠帝纪》颜师古注引张晏曰:“秦律敢有挟书者族。”汉惠帝四年(前 191)除挟书律,为学术传承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而汉文帝使晁错向济南伏生习《尚书》,汉景帝时辕固以治《诗》而为博士(《汉书·儒林传》)等事例,以及汉初统治者“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的举措,都对汉初经学发展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及为博士置弟子员,使经学传承获得了制度性保障,原本主要依靠私学教授的经学传习,现在有了官学授受,从此形成两汉经学传承途径方面官学与私学并重的局面。同时,这意味着官员的遴选补充、士人的向上流动出现了新的途径,从而开后世科举制度之先风。博士官则因增加了教育及培养官员的职能,获得了比原来仅“备顾问”更加重要的地位。经学与现实禄利的紧密结合,引发了解经繁琐、排斥异己等种种弊端。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与班固《汉书·儒林传赞》对此都有严厉的批评。

汉武帝时期的经学,以《公羊春秋》最为兴盛,以董仲舒为代表人物。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的思想与方法引入经学,后世称为经学的“神学化”,成为汉代经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公羊》学还为武帝时代设计并提供了一整套的社会政治理论,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有“大一统”、“尊王攘夷”、“王者无外”、王道三纲等;在论证西汉王朝合法性方面,有三统说、孔子“为汉制法”说等;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方面,则有“阴阳五行灾异说”、《春秋》决狱……《公羊春秋》学说的兴盛与武帝时期中央皇权渐渐加强而至于强盛的历史趋势相对应。至昭宣时期,《公羊春秋》所主张的王朝更替理论,已不合乎统治集团的利益,《公羊》学者所主张的“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更是直接威胁到西汉王朝的存续,因此昭帝时立《穀梁春秋》博士,被认为亦有削弱《公羊学》的用意。昭帝增立《穀梁春秋》的原因,除了《穀梁春秋》强调“尊王”、“亲亲”等自身理论原因,还有汉昭帝作为喜爱《穀梁春秋》的卫太子之孙的个人原因。(参见余全介:《经学与政治——论刘贺立而复废与〈穀梁春秋〉增立博士的关系》,《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昭、宣、元之际,“温柔敦厚”的《诗》教取代了刑名色彩较强的《公羊春秋》,成为显学。这一时期位及丞相或御史大夫的蔡义、韦贤、韦玄成、薛广德、匡衡、萧望之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诗经》学者。汉哀帝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汉书·楚元王传》),虽然当时遭到诸博士

反对未能成功,但古文经自此正式登上了政治与学术的舞台,并且声势越来越大。西汉末期,王莽借助经学“托古改制”,强迫汉室禅让帝位,并依据《周礼》建立新官制,获得了一部分经学学者的支持,同时另有一部分以卓茂、龚胜为代表的儒者,则表现出了坚决不与王莽合作的立场。

东汉经学是今文与古文共同发展的时期。汉光武帝重视经学,“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后汉书·儒林列传》)。十四博士都为今文经学。汉章帝时,古文经学虽不立博士,但也得到了官方重视,并以“擢高第为讲郎”的方式有了官方传承。建初四年(79)白虎观会议后,“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后汉书·儒林列传》)。

东汉还是讖纬之学最为发达的时代。一般认为,讖纬之学兴起于西汉哀、平时期,讖是预测吉凶的图记或文字,纬则意指对经的解释,讖纬往往连言。六经各有纬书,如《易经》有《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等,《尚书》有《璇玑铃》、《考灵曜》等,甚至六经之外,如《孝经》也有《援神契》、《钩命诀》等对应的纬书。讖纬之学不仅对于经学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纬书本身,因为与经的对应关系,也应被视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光武帝藉“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讖言起兵(《后汉书·光武帝纪》),又利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讖言即位(《后汉书·祭祀志上》),因此尤其重视讖纬,从而形成了东汉以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的学术风气。这一时期,无论政治礼制的制订,还是经书的校订,都以讖纬作为神圣依据。如东汉光武帝封禅泰山的《封禅文》,不足八百字中,有近三百字引用了《河图》、《洛书》等讖书;被视为东汉官方政治学术纲领的《白虎通》,其中便有对纬书的大量引用。纬书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东汉,还延及后世,如古代社会被视为基本道德纲领的“三纲”,便出自《礼纬·含文嘉》。

因此对纬学的研究,也值得重视。

东汉中期,官方经学渐渐衰落。《后汉书·儒林列传》中记载了汉安帝时代“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芟竖,至于薪刈其下”的荒凉景象。东汉后期的政治特点在于“国命委于阉寺”(《后汉书·党锢列传》),儒者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但这并未影响到东汉经学的繁荣。在东汉桓、灵之际的“党锢之祸”中,被禁锢的儒者纷纷退而修习经业,如郑玄“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后汉书·郑玄传》),荀爽“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汉书·荀爽传》),张奂“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汉书·张奂传》)等,反倒对东汉经学的发展有所推动。

官方经学之外,东汉因是强宗大姓的时代,故形成了数量可观的经学世家,成为东汉经学传承的重要支撑。官学对学术的影响力的逐渐减弱与家学的日渐强盛,使得东汉学者有可能摆脱西汉谨严的师法,可以兼通多种家派的经学,如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东汉初期的尹敏习《欧阳尚书》,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而景鸾则习《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又撰《礼内外说》。至东汉后半期,这一综合的风气则更加明显,如何休有“精研六经”之名,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至于贾逵、马融、郑玄等,更是被赞为“通儒”。可以说,东汉后期,是一个“通儒”的时代,而郑玄则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后汉书·郑玄传》盛赞其“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既是这一“经学时代”的集大成者,也成为这一“经学时代”的尾声。此后,经学的辉煌便渐渐被玄学的洪流湮没了。

本书主体部分由郑杰文、李梅、雷霞、邹应龙等合作编撰,借鉴了郑杰文、李梅编撰的《秦汉思想学术编年》的某些材料。后由俞林波、苏红燕做文献核查,并参与了部分通稿工作。清样校对主要由李梅、

俞艳庭完成,另外还有郭焱、殷仁允、薛雨、陈恳、李飞、徐溪、盖翠杰、葛洪春、张裕强等十数位同学参加了资料核校工作。另外,附录二《出土文献所见秦汉学术》由曹峰、孙燕红撰。

李梅

2014 年 10 月

目 录

总序	1
编纂凡例	1
前言	1

秦代经学学术编年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庚辰(前 221)	3
尚水德	3
定官制,行郡县	4
改《大武》之舞为《五行》之舞	5
始皇二十七年 辛巳(前 220)	6
为极庙	6
始皇二十八年 壬午(前 219)	6
封禅泰山	6
秦有博士官	8
伏生为秦博士	9
秦博士用儒家之言为始皇解说湘君	9
始皇三十一年 乙酉(前 216)	10
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	10
始皇三十四年 戊子(前 213)	10
焚书禁百家言	10
刘交、鲁穆生、白生、申公受《诗》于浮丘伯	13
孔鲋藏书	13
伏生壁藏《尚书》	14